

一切始于9岁那一瞥——考文垂的破界人生与体育理想

新华社记者 姬烨 高鸣

在希腊纳瓦里诺海岸的春日海风中,41岁的柯丝蒂·考文垂轻抚胸前的五环徽章。2025年3月20日,当国际奥委会第144次全会宣布她当选该组织第十任主席时,这位非洲泳坛传奇依然难忘33年前的光影——那个9岁的津巴布韦女孩趴在老旧电视机前,巴塞罗那奥运会跳水池的粼粼波光在她眸中投下永恒的星光。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有津巴布韦跳水选手参加比赛,那个赛场让我难忘——户外泳池倚倚山丘,非常特别。不知怎的,那个瞬间就抓住了我的眼球。”考文垂向新华社等国际媒体追忆道。

“我对父母说:‘有一天我要参加奥运会,为津巴布韦赢得金牌。’他们笑着回答:‘好啊!但这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这个被呵护的梦想最终绽放为七枚奥运奖牌的辉煌,更在今日升华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座里程碑:考文垂成为131年来首位执掌国际奥委会的女性领导者,也是该组织首位来自非洲的掌舵人。

自1894年成立以来,国际奥委会此前历经九任主席——八位欧洲人和一位美国人。考文垂是历史上第二位竞选主席职位的女性。她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9票,以刚好过半数票的优势战胜其他六位候选人而当选。

“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当我9岁的时候,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站在这里。”当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宣布她当选之后,考文垂动情地说,“今天的选举打破了多重天花板,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它表明国际奥委会已真正全球化,已发展成一个真正拥抱多样性的组织。”

泳池里的非洲传奇:感受体育的力量

1983年9月16日,考文垂出生于哈拉雷,两岁时在母亲和祖父指导下开始学习游泳。六岁加入游泳俱乐部后,她迅速展现出天赋。“泳池是我的避风港。我在学校表现尚可,但从来不是优等生。在水中,我找到了自我。”

由于津巴布韦没有室内泳池,冬季天冷时,她还练过曲棍球、越野跑和网球等运动。14岁时打曲

棍球受伤,促使考文垂专注于游泳。16岁时,还在读高中的她,获得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参赛资格。

“从津巴布韦远道而来,踏上澳大利亚的泳池,确实有点胆怯。”考文垂回忆说。

在悉尼,她虽未获奖牌,但晋级奥运会半决赛,已书写了津巴布韦的游泳历史。不过,最令她记忆深刻的,不是在泳池,而是在奥运村遇见拳王穆罕默德·阿里。

“一天晚饭后回宿舍时,看到一群人围着阿里。我简直惊呆了!他花了三个小时才走到门口,因为太多人簇拥着他。那个瞬间点燃了我内心的某种火焰。”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四年后的雅典,她斩获三枚奥运奖牌,包括津巴布韦首枚个人奥运金牌(200米仰泳)。“站在领奖台上,一切恍若梦境。回想9岁的自己,如今已近21岁,终于实现了目标和梦想。”她在夺冠后说。

载誉归国时,考文垂受到狂热欢迎。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津巴布韦,她的奥运金牌成为一种象征。“所有同胞都来对我说‘谢谢,我们如此骄傲’。这让我亲眼见证体育如何打破隔阂,在分歧中凝聚人心。”她说。

今年1月,当考文垂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候选人向国际奥委会委员陈述时,她也分享了这些故事。“我参选的理由不仅是空谈‘体育的变革力量’,而是亲身经历并深信于此。尤其在当今分裂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能架起桥梁,重建信任,展现人性至善。”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考文垂运动生涯的高光时刻,她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游泳比赛中收获1金3银。“每当提起北京奥运会,我总会笑得很灿烂。”

2022年北京冬奥会,“水立方”化身“冰立方”,令现场观赛的考文垂印象深刻。“当我看到自己在2008年比赛的泳池变成冰壶赛场,并亲眼见证冬季运动员在那里争夺奖牌时,我感到非常震撼与自豪。”

结束了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征程后,考文垂最终带着七枚奥运奖牌(2金4银1铜)退役,创下非洲运动员之最。

从哈拉雷到奥本:奥运团结基金改变命运

如果说体育为考文垂打开了一扇门,那么国际奥委会发起的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奖学金,则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7岁时,她离开家乡哈拉雷,赴美国奥本大学就读酒店与餐饮管理专业。她笑着说:“获得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资助后,我甚至能在周末吃炸鸡而不是金枪鱼沙拉三明治。这些微小改变让我成为更好的运动员。”

考文垂还记得,当她乘坐飞机第一次降落在美国亚特兰大时的那种忐忑——“毕竟我们国家太小,哈拉雷更是人人都彼此相识。但想到即将进入重视训练与教育的学校,又难掩兴奋。”

在奥本大学游泳馆,她第一次体验到“集体进化”的魔力。“这里男女混合训练的游泳队有60多名队员,我突然拥有了30个‘姐妹’,在津巴布韦常年独自训练的我,第一次置身于集体追梦的氛围;这里没人是最强,但所有人都在为共同目标突破自我。”

考文垂带领奥本大学的“老虎”游泳队夺得2002、2003和2004年NCAA(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锦标赛冠军。“奥本大学为我提供了重要平台,队友们成了终身家人。”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考文垂获得女子200米仰泳冠军,而她的美国同学霍泽尔则获得了银牌。

“我的美国队友霍泽尔与我同吃同住,北京奥运会上我们并肩站上领奖台。”考文垂说,霍泽尔采访时说的一番话让她至今深受感动。“当记者问她,‘与外国对手一起训练是否培养了竞争对手’时,她的回答震撼了我:‘要成为奥运冠军,我必须确信,自己击败的是与我享有同等机会的世界最强者。’”

平衡多重角色:母亲、妻子与全球使命

2013年,考文垂以运动员委员的身份加入国际奥委会。2018—2021年,她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并进入执委会,2023年再次进入执委会。作为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她还深度参与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筹备及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战略规划。

与此同时,她致力于回馈祖国:创立考文垂学院,在非洲多国开展儿童防溺水培训;与丈夫蒂罗内·西沃德创建“HEROES”计划,通过体育游戏为贫困地区6—13岁儿童教授团队协作、抗压能力等软技能。

她在2018年出任津巴布韦青年、体育、艺术和娱乐部长,推动立法打击体育赛事操纵、虐待和性骚扰。“这段旅程并不轻松。”考文垂说,在她担任体育部长时,有两名田径200米选手在巴黎奥运会进入决赛,“在我退役后这还是首次”。

考文垂的家庭生活同样美满。她在2010年与西沃德成婚,2019年迎来大女儿艾拉,2024年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诞下二女儿莉莉。在希腊的主席选举期间,她的家人一直陪伴左右。

“这次怀二胎更有经验,不会为婴儿每声咳嗽惊慌。莉莉四周大就开始随我全球出差,与她相处的时光让我记起奋斗的意义——为下一代创造更易触及的体育未来。”考文垂说。

边带娃边工作,她坦言,每晚回到房间,看到丈夫、5岁的大女儿艾拉和襁褓中的小女儿莉莉,是她的“充电”方式。

今年6月23日奥林匹克日之后,考文垂将正式接棒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可以预见,平衡家庭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职责,将是考文垂需要面对的考验。

接下来三个月的过渡期,她将非常忙碌。一方面需要尽快熟悉适应新的岗位,另一方面要举家从津巴布韦搬到瑞士洛桑。

“我和丈夫结婚时仍在训练,常被问及频繁搬家是否影响婚姻。但我们约定:只要在一起,哪里都是家。津巴布韦永远是根,但家更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空间。”

3月20日,当考文垂当选的消息传来,5岁大女儿的祝贺别具意义:“我的女儿跑过来说:‘妈妈你赢了!’”

无论是运动员考文垂,还是当下竞选获任的考文垂,无疑已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榜样。

“希望女儿们成长时能明白,她们能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达成任何想实现的目标。”

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上个月,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发布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自2023年2月成立至去年底的业务开展情况。作为全国唯一的、专门处理体育领域纠纷的仲裁机构,仲裁委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设立的体育仲裁制度落地实施——中国的“体育法官”,正在为体育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赛场外的“裁判员”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首次写入设立体育仲裁机构的条款。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增设“体育仲裁”专章,明确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组建体育仲裁机构。法律的完善,是仲裁委成立的重要前提。

“过去的体育纠纷,往往依赖协会内部解决,缺乏完善的救济渠道。”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韩向飞坦言,在制度空窗期,四类纠纷尤为棘手:协会处罚争议、运动员欠薪纠纷、注册资格纠纷、兴奋剂违规问题等。专业性强、规则特殊的体育纠纷,常因法律程序缺位陷入“三不管”境地。

“假如协会给运动员开罚单,是很难进入司法程序的,这意味着协会处理已经是终局了。”韩向飞说,“又比如欠薪纠纷,运动员的工作合同与普通劳动合同不同,劳动仲裁机构不愿受理,法院又不一定接,往往诉求无门。”

因此,兼顾专业、公平和效率的仲裁制度,完善了体育纠纷的救济渠道,弥补了争议解决的机制空白。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生涯较短、赛事不等人等特殊特性,体育仲裁时限为常规3个月、(大赛时)特别程序24小时,相较司法程序更加高效便捷,最大程度保护各方利益。

截至去年底,仲裁委累计接收仲裁申请173起,立案审理82件,案件覆盖足球、冰球等六类运动项目。此外,仲裁委还在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与仲裁制度的衔接,目前已有中国足球协会等4家全国性协会将体育仲裁机制纳入章程,49家项目中心、单项体育协会完成管理规则修订或赛事条款增补。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卢松说:“过去解决体育纠纷主要靠三个渠道,即体育协会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法院和劳动仲裁。体育仲裁委成立后,相当程度上接替了法院的工作。”作为独立第三方,“赛场外的裁判员”,仲裁委既为运动员提供权益救济渠道,亦促使体育组织完善内部规则,助力行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案件多为“民告官”

仲裁委公开的数据显示,不少体育仲裁案件呈现出类似“民告官”式的特征。《2024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年报》(以下简称《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民个人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有55例,而作为被申请人仅3例;对比之下,法人(如俱乐部)作为被申请人的有47例,体育社会组织则有24例。综合来看,涉及体育纠纷时,个体作为仲裁申请人的数量较多,各类组织机构则往往处于被申请人地位。不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引发了个体通过仲裁维权的需求。

类似“民告官”案例存在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合同、转会纠纷多;二是运动员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学生,法律意识薄弱,往往导致维权困难。

此前,某未成年运动员因青训合同纠纷陷入职业困境。俱乐部与其父母签订协议时,设置了一系列包括高额解约金在内的、只有俱乐部可以单方解除的条款;后因家庭与俱乐部矛盾,运动员面临无法转会且被禁止注册参赛的难题。

此案若严格按照合同条款裁决,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但直接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据。最终,仲裁委促成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运动员得以重返赛场。对这样的裁决结果,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钢表示:“未来体育仲裁规则修订应更多考虑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民告官”多,不意味着仲裁委“拉偏架”。实践中,需要兼顾各方合法权益。某大学生运动员转会后被原俱乐部和新俱乐部双重注册,引发“一女二嫁”争议,被禁止参加某项全国性赛事。仲裁委在尊重运动员意见的同时,充分考量了俱乐部的利益,最终实现了相对平衡的裁决结果。

“一方面,运动员享有注册与交流的权利;另一方面,俱乐部长期培养运动员成本高,如果运动员成才后就被挖走,对培养运动员的俱乐部的利益损害也很大。”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赵健说,体育仲裁的作用,就是依照法律法规保护各方权利、合理解决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足球领域纠纷最为多发。《年报》显示,足球领域纠纷占2023—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总数的86.5%。“足球领域案件范围广、爆点多、串案多。”赵健总结道。

仲裁“主权”需维护

体育仲裁首次引发大规模“破圈”关注,当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理孙杨案件一事。孙杨最终被判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被禁赛4年3个月,引发轰动。专家普遍认为,事件折射出中国体育界对国际规则和仲裁事务了解不足的现实,也反映了中国体育仲裁加强国际交流的必要性。

“一些案件暴露出了国内缺乏专门体育仲裁机制的被动性。”袁钢说,我国运动员及其团队在处理国际体育纠纷时因对体育仲裁认知不足、缺乏经验造成了诸多问题,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国际体育法律思维与规则意识。

不少专家还提出,一些外籍运动员或教练与国内俱乐部或协会的纠纷,若国内未设体育仲裁机构,外方多数会移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这意味着我们在相关争议中丧失仲裁的管辖权。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某种程度上是仲裁“主权”问题。

巴黎奥运会特别仲裁庭12位仲裁员中,亚洲代表仅有卢松一位;另设的反兴奋剂仲裁庭中,清一色都是欧美面孔。卢松表示,当下国内体育仲裁人才力量依旧不足,需要继续学习和对接国际规则,不断培养壮大仲裁员队伍。

“要和国际接轨,包括仲裁机构管理、仲裁员选聘、仲裁规则细化等。”韩向飞说,等发展更为成熟、积累更多经验之后,仲裁委“或许能为中国举办的国际赛事提供仲裁服务”。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体育仲裁大有可为的领域。“未来,我们希望为国际体育纠纷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赵健还建议扩大体育仲裁范围,他表示,体育争议具有复合性,往往同时涉及商事、劳动、体育等多个领域,不可能同一个争议分为几部分由不同机构受理。“建议凡是与体育有关的纠纷,当事人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的,仲裁委均可受理。”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中国有「体育法官」了

许仕豪 李丽 吴丽楠

班卡、杨扬将分别竞选连任WADA主席和副主席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记者姬烨、马向菲)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31日消息,该机构正式公布主席及副主席选举候选人名单。现任主席班卡与副主席杨扬将各自作为唯一候选人寻求连任,选举将于5月29日进行。

波兰班卡和中国冬奥首金得主杨扬分别于2020年首次当选WADA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三年,两人的第二个任期将于2025年12月31日结束。如本次成功连任,两人的第三个任期将于2026年1月1日开始。

根据WADA相关规定,主席与副主席须获理事会三分之二多数票支持。选举结果将于5月29日由理事会线上投票产生。

杨扬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为中国夺得首枚冬奥金牌。她曾于2010年至2018年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期间在国际奥委会多个委员会任职,包括担任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委员、两次担任冬青奥会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等,深度参与了国际奥委会各方面的工作。现年40岁的班卡曾是400米跑运动员,曾担任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部长。

意甲·

拉齐奥平都灵

3月31日,在2024—2025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0轮比赛中,拉齐奥队主场1比1战平都灵队。

图为当日,,都灵队守门员米林科维奇-萨维奇(中)未能扑出拉齐奥队球员马鲁西奇的射门。

(新华社发)



从街舞、足球到垂钓,体育交流助力深化中越民间友谊

新华社南宁4月1日电(记者曹祎铭、张枫)当三月初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5 Juste Debout世界街舞总决赛上创下中国选手历史最佳成绩的符雋熙站上广西凭祥友谊关前的舞台时,来自中国和越南的街舞运动员们同时爆发出热烈掌声。

近日,2025中越青年街舞文化交流节在位于中越边境地区的友谊关关楼广场举行。来自中越两国的街舞青年以赛会友、以舞传情、共话友谊。

活动中,中越两国青少年舞者们的精湛舞技和饱满热情点燃了

全场。中方街舞运动员带来的《panda侠》等街舞表演,动作干脆利落,技巧与力量巧妙结合;来自越南的街舞运动员在《漫天芬芳》等表演中将越南传统服饰与现代街舞相结合,以流畅自然的动作和富有越南特色的音乐,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越南街舞动作柔和,侧重波浪式律动,音乐节奏活泼,充满热带风情,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借鉴的。”符雋熙说。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也是中越人文交流年。近些年,多种多样的民间体育赛事成为两国人民

深化友谊的重要载体。

3月8日,2025年凭祥市首届中越友谊钓鱼比赛在风光旖旎的平而河畔开赛,来自中越两国的100名爱好者共同挥杆,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比赛中,越南选手武文勇成功擒获4.2公斤压哨鲤鱼,引发全场欢呼。越南选手罗德南赛后与身边的中国选手握手致意,“两国一河之隔,大家在钓鱼方面是有共同语言和话题的,赛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在中越两国民间体育交流中,足球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今年元宵节,第30届中国东兴—越南芒

街元宵足球友谊赛拉开帷幕。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的跨国体育活动交往历史悠久。对于两地的民众而言,在元宵佳节共同观看一场精彩的跨国足球友谊赛,早已成为一项“固定节目”。

东兴市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石林丽说,回顾近些年的元宵足球赛,“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好友”的观念已经深入双方球员心中。

以赛为媒,以节会友,跨境赛事远不止这些。跆拳道、拳击、中国象棋、气排球、武术……丰富多样的体育赛事交流活动,正在不断续写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佳话。